



制度因素、对外贸易与 中国新型比较优势构建

邱 斌 孙少勤 唐保庆/著



科学出版社

东南大学“双一流”建设出版基金资助

制度因素、对外贸易与 中国新型比较优势构建

邱 斌 孙少勤 唐保庆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构建制度比较优势推动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视角出发,分别从金融制度、教育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和法制建设四个维度研究制度因素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并进一步对不同分类行业 and 不同出口目的地的制度影响进行分析。针对不同制度因素所对应的研究结论,本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提升金融服务效率,通过增加教育支出积累人力资本,采取差别化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以及提升法制建设水平等方面。本书在制度因素影响对外贸易的微观机制、区域特征以及贸易模式转变等方面进行较为开拓性的研究,这对我国在下一阶段构建新型比较优势和制定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适合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世界经济等相关领域的院校师生、科研工作者、进出口企业管理人员以及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人员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因素、对外贸易与中国新型比较优势构建/邱斌,孙少勤,唐保庆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03-054905-1

I. ①制… II. ①邱… ②孙… ③唐… III. ①对外贸易—研究—中国 IV. ①F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2239号

责任编辑:魏如萍 陶璇/责任校对:王晓茜

责任印制:吴兆东/封面设计:无极书装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0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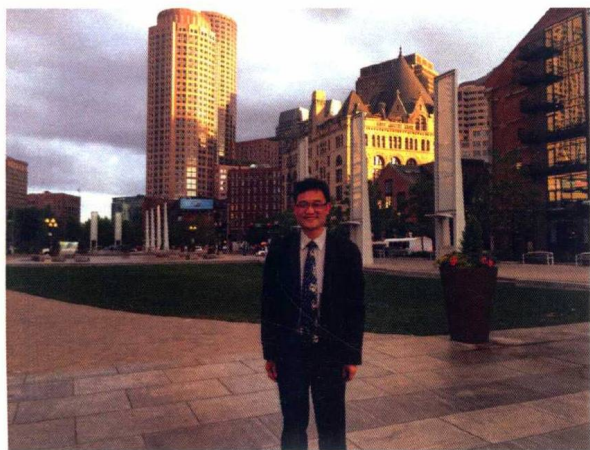
字数:220 000

定价:7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邱斌，男，博士，东南大学特聘教授，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2010~2011年），马里兰大学访问学者（2003年），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访问学者（2008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常务理事，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秘书长，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世界经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与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等高水平项目多项。已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世界经济》《管理世界》及SSCI期刊等国内外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高水平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1部。曾获东南大学青年教师授课竞赛一等奖第一名，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次、三等奖一次，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苏经济全球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前言

制度因素与对外贸易的相互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的关注对象。起初，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关注特定制度或特定法令对经济的影响，如英国《谷物法》的存废问题所引发的旷日持久的辩论。由于 200 多年前人们的经济观念还停留在财富是金银的理念上，对于贸易出超的关注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嘉图所倡导的比较优势学说不仅使得英国在从工业革命中脱胎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过程中更新思想观念，同时也开辟了一个不断深化、至今为贸易经济学家所不断丰富的理论体系。

有关制度促进贸易的学说，最初关注交易成本的降低、合约的执行效率及基础经济制度的建立，以科斯、威廉姆森和诺斯为代表。科斯、威廉姆森和诺斯的学说本身并不是为对外贸易而准备的，他们的理论更加关注制度的基本层面对市场效率和经济绩效的影响。Helpman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较为宽广的经济学家，他所提出的“经济增长的秘密”由四个因素构成，其中制度（institution）和国际贸易[这里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主要指国际贸易]作为四个“I”（innovation, interdependence, inequality, institution）中的两个促进经济增长的“秘密”使人眼睛为之一亮。Levchenko 和 Nunn 则相对直接地把制度质量的变化和国际贸易模式联系起来，其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也同样起源于上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几位大家。

近年来，制度因素影响贸易的研究正向着丰富化和微观化的趋势发展。所谓丰富化是指制度因素的各种维度包括政治、文化、法律等都成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上来说，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的政策法律体系、是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否

加入一个货币联盟、是否加入一个或多个贸易协定、是否创立自贸区等因素都成为考察对象。所谓微观化是指随着贸易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发展和微观企业数据的可获得性,从制度微观层面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研究不断呈现,在这方面,Chaney 从流动性约束、Manova 从融资约束视角均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Berkowitz 则研究了产品复杂度、相关法律和贸易的地理流向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基于行业或企业层面的汇率传递效应对企业贸易的方方面面的影响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除了正式制度对贸易的影响之外,非正式制度或安排对贸易的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这方面,Rauch 教授所开辟的华人网络是对正式贸易制度的一种近似替代的论文开辟了该领域研究的先河。同样地,牛津大学的 Parsons 利用一项天然实验所研究的越南船民在美国某个州聚集,则该州和越南贸易量即大增的论文也为非正式贸易制度或安排提供了某种佐证。

诚然,制度因素对对外贸易的影响并不能改变国际贸易必须依托比较优势这一基本理论。不管是比较优势、特定要素模型、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以及其后发展出来的“新”贸易理论或“新新”贸易理论,对外贸易的源头活水都是形形色色的比较优势。因此,关注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由哪些特定因素构成的便成为此领域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金融依赖程度、工作复杂度、R&D 投入强度、关键要素投入强度及专属性投资联系等五个维度,把我国的 20 个行业分为上述五个因素的高低不同的两大类,从而界定其行业特征,在这个基础上研究金融制度、教育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法制建设等四个制度因素与上述行业特征对贸易的联合影响。

近年来,国内学者特别是一批中青年学者从各种维度和视角对制度影响贸易这一领域做了不少探索性的研究,特别是从契约执行效率、省际制度差异、经济特区、地理与文化等视角做了大量经验研究,得出了不少新颖的学术结论,这对进入“新常态”后的我国新时期对外贸易的开展都有不少政策启示。

本书正是作者在上述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系列研究和探索,在构建我国对外贸易的行业特征及制度因素的量化研究方面做出了些许探索,所

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制度因素是构成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如果制度因素和一国行业特征紧密结合和联动，可能会为一国构建新型比较优势提供可能的渠道和路径。

由于作者理论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作 者

2017年8月



目 录

第 1 章 导言	1
1.1 问题的提出	2
1.2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5
1.3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5
1.4 全书结构安排	9
第 2 章 国际贸易中的制度及其演化	11
2.1 制度与贸易的相互关系	11
2.2 贸易制度的演化	19
2.3 非正式贸易制度及安排	23
2.4 制度比较优势及其构成	27
2.5 小结	31
第 3 章 制度与贸易的典型化事实	34
3.1 中国国际贸易的特征事实	34
3.2 与贸易有关的制度因素的特征事实	41
3.3 制度与贸易的联动关系	45
第 4 章 制度促进贸易的理论机理及其测度	47
4.1 制度促进贸易的一般机理	47
4.2 制度影响贸易的理论推导	51
4.3 对制度影响贸易的分解说明	55
4.4 国家制度和行业特征的测度方法	58
第 5 章 制度因素与新型比较优势构建	62
5.1 引言	62
5.2 相关文献回顾	64
5.3 经验检验	67
5.4 稳健性检验	81
5.5 结论与相关启示	86

第 6 章 法制建设水平与新型比较优势构建	89
6.1 问题的提出	89
6.2 法制建设影响出口的传导机制	91
6.3 经验检验	95
6.4 结论与相关启示	106
第 7 章 金融发展与新型比较优势构建	110
7.1 引言	110
7.2 理论机制	113
7.3 计量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116
7.4 实证结果及分析	118
7.5 结论与相关启示	125
第 8 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27
8.1 主要结论	127
8.2 政策含义	131
8.3 将来的研究方向	138
参考文献	142
附录	153
后记	155

第 1 章

导 言

始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近 40 年,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标志性的大事有:2009 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世界第二大国,2012 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我国的对外贸易从小到大,从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到出口大量高科技产品,从引进外资成为跨国公司外包的主要产地到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蓬勃发展,创造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辉煌业绩。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也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传统的以劳动力比较优势作为基础的出口已经受到来自以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诸多国家的强有力挑战,我国自身的环境承载能力也不断走向极限。在上述情形下,如何找到能够促使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比较优势便成为现阶段企业、政府和学界共同面对的问题。自 200 多年前的工业革命发生以后,经济学家一直关注制度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成效和机制。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发展自然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本书关注如何在继续保持我国传统资源禀赋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本章首先提出研究的问题及其背景,并指出研究的创新与不足,并对全书构架和研究内容作出说明。

1.1 问题的提出

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增长中的核心问题。在李嘉图(1772~1823)时代,制度对经济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如何应对英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剧和人口随之增多后的粮食短缺问题。当时,在对待到底要不要进口粮食的问题上,新兴工业企业主和意欲维护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地主阶层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谷物法》的去留成为两个社会阶层激辩的核心问题。李嘉图在其著名的英国和葡萄牙生产葡萄酒和布匹的论证中,证明了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均不占绝对优势的英国,为什么应在各自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与生产率更高的葡萄牙进行交换,从而使两个国家的福利均能够提高。在工业化方兴未艾的李嘉图时代,制度对国际贸易的作用和影响集中体现在一部法律是否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这一具体问题上,当然,这一过程从李嘉图 1815 年开始撰文提出他的比较优势学说开始到 1846 年《谷物法》被废除,英国经历了一场长达几十年的全国性辩论和思想转变。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自李嘉图时代以来,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贸易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设计也愈加完善和精细,各种制度对贸易的影响已经复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过去的 200 多年中,国际贸易理论也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出现了诸多演化,大体来说是按照李嘉图模型、特定要素模型、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这一路径逐渐向前发展的(许斌,2009),上述理论的演进基本上对应了国际贸易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从产业内贸易到产品内贸易,再从产品内贸易到发挥工序间比较优势这一分工逐渐深化的过程。

从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来看,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至今近 40 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进出口国,中国所参与全球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外贸的进

一步发展,近年来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人力资本上升、生态环境恶化、产品创新不足等一系列“瓶颈”问题开始凸显,要想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政治、法律、文化等)找到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促进对外贸易的可能之策。从宏观层面来说,我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际产能合作”等大政方针正在推进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秉持和发展,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格局和地理方向。从微观层面来看,国家的法律法规、税收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会从方方面面影响企业的各种决策,从而改变企业的出口决策、出口行为和出口绩效。

制度对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和维度。第一,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制度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来影响贸易。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一国的对外贸易首先要基于该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而一国经济增长的“秘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 Helpman (2004) 所说是受到四个“I”影响的,其中一个“I”就是 institution (制度),一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都会对一国的贸易产生影响。例如,一国经济制度中的金融制度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现实经济中,有的产业对金融制度的依赖性较高,一国金融制度的设计特别是汇率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些产业的发展。正如克鲁格曼在《汇率的不稳定性》一书中所说“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通常并不像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畅通无阻、有效,相反,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克鲁格曼进一步地说明“世界经济的不完全一体化既是汇率不稳定的根源,又是汇率不稳定的结果”。第二,由于国家之间是有边界的,一国的制度因素对于国际贸易是有边界效应的。这一被称为边界之谜(border puzzle)的问题最初由 McCallum 于 1995 年提出。McCallum 的研究发现,即使对于像美国和加拿大这样地理邻近且经济一体化程度相当高的发达国家,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远远大于加拿大各省与美国各州之间的贸易(已经考虑了相同的距离和规模)。这说明即使像美国和加拿大这样拥有较为成熟市场制度的国家,两国之间各种制度因素的差异依然会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和贸易的扭曲。从以往此领域的研究文献来

看,一大批经济学者如 Anderson 和 van Wincoop (2003)、Wei 和 Frankel (1996)、赵永亮和徐勇 (2007) 等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他们的研究发现,在设置了国家间的共同边界、共同货币以及相应的语言、文化因素等虚拟变量后,包括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外资政策、相关管制等在内的制度指标均产生了边界效应。上述研究给我们的启发是,制度因素和环境的改善可以大大地降低贸易成本和促进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第三,从微观层面来看,不同的制度因素或制度设计可以显著地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包括企业是否出口、出口多少以及企业出口的地理方向。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出口国的相关法律制度越完善,出口国企业越倾向于生产技术复杂度高的产品,一国也越容易在国际上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一国高技术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倾向于生产高技术复杂度的产品,一国的工业结构也随之改变。当然,从进口国的角度来看,由于对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甄别成本较高,一般来说,进口国的制度设计一般倾向于对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进口持相对审慎的态度。由于进口国和出口国在诸项制度的“匹配性”上存在较大差异,一国企业的出口产品种类、相应的出口数量以及出口的地理方向都蕴含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制度是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当前,由于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在持续,各主要工业国的经济发展普遍遇到瓶颈,世界贸易持续低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所倡导的各种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举措大行其道,欧洲难民危机使得民粹主义势力有所抬头,全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我国的对外贸易遭受空前挑战。这些挑战使得我们在继续秉持对外贸易发展的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亟须从各项制度的完善上找到新型比较优势。毋庸讳言,在任何时候,包含劳动力成本差异、技术水平差异和资源禀赋差异的传统比较优势都是一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基础。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国假如具有制度上的比较优势,该国就更容易克服各种交易成本,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大的收益。更进一步地,假如一国的制度比较优势和传统比较优势相得益彰、互相匹配和互相促进,则一国就能够取得对外贸易的新型比较优势。本书就是在上述思路下,结合中国实际,借鉴国内外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

选取了从技术上更容易衡量的金融制度、教育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和法制建设水平等四个方面的制度因素,结合国际上通行的行业特征(金融依赖程度、工作复杂度、R&D投入强度、关键投入强度和专属性投资联系等五个方面),研究制度因素如何与行业特征联合作用,从而塑造我国对外贸易的新型比较优势。

1.2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本书首先在描述我国对外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同时直面在现阶段所遇到的新挑战,由此提出从制度因素视角认识我国构建对外贸易新型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2章);然后描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和典型制度因素的典型化事实(第3章),并阐述制度因素影响对外贸易的一般机制和特定原理及制度因素的测度(第4章)。在上述章节的基础上,第5章对制度因素与传统比较优势相结合并构建可能的新型比较优势进行实证检验。第6章和第7章分别从法制建设水平和金融发展这两个重要制度因素视角对本书主题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第8章得出主要结论,提出对策建议并指明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方向。具体的研究技术路线见图1-1。

1.3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1.3.1 可能的创新之处

本书在较为系统地梳理前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制度因素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机制并进而构筑新型比较优势这一前沿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相应的实证检验。总的来说,本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之处。

(1) 研究选题的创新。在经典经济学文献中,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更多反映的是以Coast(1937)、Williamson(1979)和North(1990)等所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企业组织、交易成本、契约理论的思考。在制度对贸易的直接影响方面,Nunn(2007)和Levchenko(2007)等作了开创性的探索,认为建立良好的合约执行环境可以降低特定行业的制度成本从而塑造出口比较优势。本书的研究选题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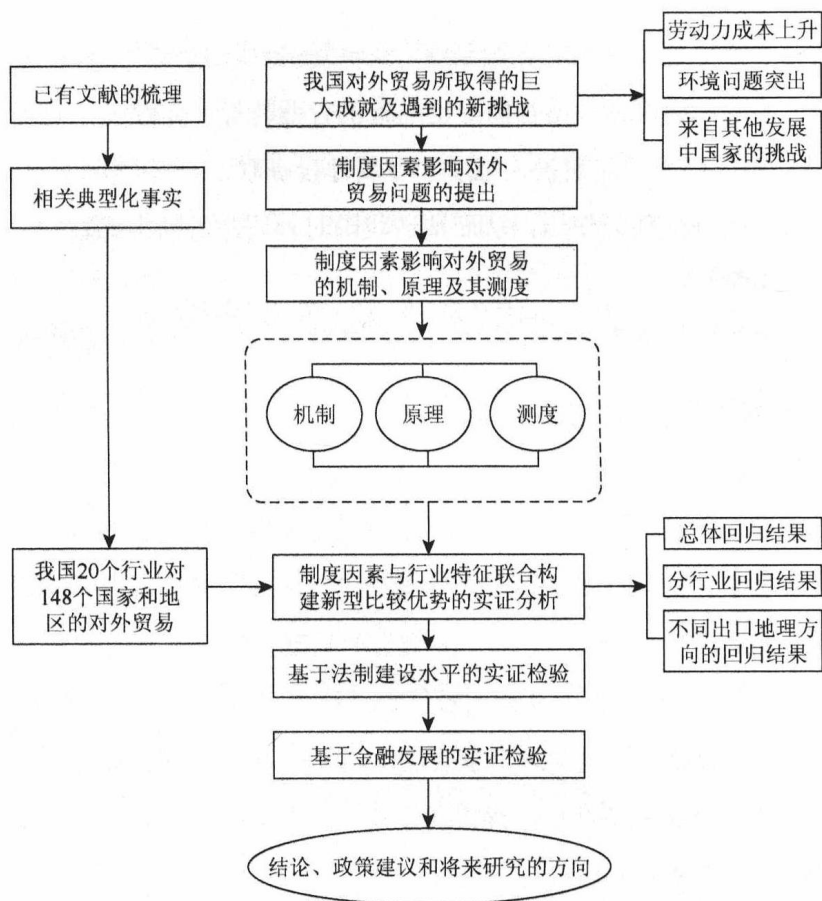


图 1-1 本书的技术路线

在 Eaton 和 Kortum (2002) 的基础上, 并进一步借助 Chor (2010) 对比较优势来源的分解方法, 成功捕捉了在一国传统和特定比较优势的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形下, 如何通过和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制度因素找到对外贸易的新型比较优势。以往国内外文献中更多注重制度因素的某个方面对促进贸易的实证研究, 本书注重制度因素的系统性和多样性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作用和影响, 具有选题上的创新性。

(2) 研究方法的创新。在本书的机制分析上, 借助 Chor (2010) 的结构分析方法, 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把反映制度因素和产业特征的变量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中, 成功地把制度因素内生, 这在模型构建上具有

一定的方法创新。在实证研究中,计量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尽可能与理论模型相对应,力争减少缩减形式(reduced form)回归所带来的实证检验与理论模型不一致的问题。在具体的回归方法的选取上,综合运用工具变量(IV)回归分析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分析以降低内生性,具有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性。

(3) 研究结论的创新。目前,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以及新的动力来源问题在学界和实际业务部门都有不少争论。本书综合理论分析和大数据的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有“释理”和“解惑”的作用。研究结论之一是要素禀赋依然在促进一国出口和塑造比较优势的过程中起到基础作用,但是应与制度因素和制度创新相结合。研究结论之二是上述传统比较优势和制度因素的结合存在“制度门槛”效应,这说明我国要继续全面深化各种制度变革和创新,为找到制度和贸易的契合点而不断努力。研究结论之三是在对特定产业和制度的协同方面,要注意不同地理出口方向国家的制度因素,即应研判我国商品出口地的法律制度特点,争取找到不同产业特征与制度因素联合作用的新型比较优势,从而创造“制度红利”。

1.3.2 研究的不足之处

由于本书的研究对象较新和较具挑战性,加之本书作者在理论功底、文献掌握、数理基础以及资料特别是特定数据库的占有方面还有较大的薄弱和不足之处,本书存在以下诸多方面的不足。

(1) 在制度因素促进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和微观机制上应进行进一步的探索。目前的理论框架尽管已经借鉴了国际上较为成熟的研究基础,但由于所研究对象复杂,以及所包含的影响因素还不够丰富,所得出的理论机制有待深化,实证模型与理论模型的拟合程度也有待提高。此外,还有众多的微观作用机制如汇率传递效应、出口退税制度、企业的福利效应等尚未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制度因素的选取由于受制于现有文献的设定,有些因素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因此,立足中国现实进一步拓展更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因素及其测度方法会有利于深化对这一研究话题的理解和量化研究。

(2)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存在较大的区域不均衡现象,本书目前尚未涉及制度因素作用的国内空间分布,需要在以后的研究加以完善。此前,李坤望和王永进(2010)考察了契约执行效率对地区出口绩效差异的影响;张杰等(2010)考察了制度因素对中国省际层面四分位行业出口差异的影响。黄玖立等(2013)发现我国经济特区在契约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上具有较大的平均出口规模和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沿着出口的集约边际展开。孙楚仁等(2014)发现制度好的省份出口制度更密集的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部分地区的生产率收敛(如我国中部地区的崛起)以及更多新型制度的建立或实践上的创新(如自贸区的设立),必须从动态视角对制度因素影响对外贸易的区域差异进行全新的研究和考察,这既是本书的不足之处,也是将来的研究方向。

(3) 由于本书考察的是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影响,并没有把服务贸易单独作为研究对象,制度因素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机制还有待深化,例如,何种制度因素对服务贸易有着更大、更具决定性的影响?深入到服务贸易内部,又是哪些服务贸易的细分形式受到何种制度因素的作用更强烈?毋庸讳言,制度因素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最大,在这方面的国际文献较多,但是基于中国数据的系统性的检验目前尚不多,这既是本书的一个不足之处,也构成将来的非常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

(4) 新的研究视角或方法应不断引进。近年来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迅速,研究方法和视角层出不穷。令人欣喜的是,近十几年来国际贸易领域内的理论创新与经济学的前续理论结合得较好,无论是“新新贸易理论”的代表性人物 Marc Melitz 对克鲁格曼理论的继承和发扬,还是对 Melitz 理论构成一定挑战的 Costas Arkolakis,他们的理论和方法都有着较好的学术上的承继性和经济学逻辑的内洽性。回到本书所研究的主题上,除了 Yu (2010) 和 Chor (2010) 所做的结构式分析探索之外,Arkolakis 竭力构造的一般均衡条件下的结构引力模型及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的方法均可加以借鉴使用,并用于制度因素促进对外贸易的研究。